

1949-1998

新

中

国

军

事

风

云

大

写

真

中南海

【全三卷】

ZHONGNANHAI
SANDAILINDAOJITI
YUGONGHEGUO
JUNSHISHILU

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

军事实录

下卷

蒋建农
Jiang Jianong
【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中南海

三代领导集体与 共和国军事实录

Jiangjiannong
● 蒋建农 ▶【主编】



中 国 经 济 出 版 社

目 录

邓小平与华北军事大演习 (1)

☆新任军委主席的重大军事决策

☆一号会议秘密召开

☆粟裕大将的边境之行

☆军委主席与总长对话录

☆女兵直闯“小中南海”

邓小平提出解放军裁减员额一百万 (38)

☆1984年国庆阅兵,似乎包含着某种向历史告别的意味

☆邓小平提出要裁减员额一百万

☆“857210023”行动

☆一夜之间人民解放军有60万干部被列为“编外”

☆脱下军装他们还按照军人应有的姿态行动

和平时期军队服从国家建设 (99)

☆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

☆修筑公路:北京和拉萨之间架起幸福的彩虹

☆抢建铁路:移山填海创造“革命速度”

☆屯垦开荒:万里边疆弘扬南泥湾精神

☆抗震救灾:子弟兵作出突出贡献

☆抗洪救灾:全力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

邓小平提出加快我军正规化建设 (167)

☆我们已经向建军的高级阶段发展

☆建国以后,我军建设进入了掌握现代技术的高级阶段

☆任何时候都要保持高度集中统一

☆整顿就是整“肿、散、骄、奢、惰”

☆管理是维系军队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

实践邓小平“三个面向”的军人····· (190)

- ☆绿色躁动中的双向选择
- ☆“折子戏”看客的忧思
- ☆三军统帅一言赢得 20 年是谋略
- ☆第四尊雕像是“白领军人”
- ☆最艰苦的地方总有着战士的刚强

重新调整人民军队编制体制····· (236)

- ☆军委、各总部、军兵种和大军区体制的调整改革
- ☆陆军合成集团军的组成
- ☆预备役部队的建立及人民武装部隶属关系的调整
- ☆武装警察部队的组建

邓小平提出恢复军衔制····· (246)

- ☆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恢复军衔制的问题
- ☆现役军官官衔的等级设置
- ☆对军衔的标志和佩带及有关问题作出规定
- ☆邓小平主席签署的授予上将军官军衔的命令

三代领导关注三军仪仗队····· (252)

- ☆仪仗司礼,是各国政府迎送国宾的最高礼仪
- ☆仪仗队是一个国家的眼睛
- ☆礼仪之式——共和国的骄傲
- ☆军乐团奏响了《星条旗永不落》
- ☆长城精神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仪仗兵

新时期中国海军陆战队····· (263)

- ☆海军陆战队被誉为“军中之军”
- ☆美国海军陆战队与英国绿色贝雷帽
- ☆中国海军陆战队的首任司令
- ☆残酷的野外生存训练

☆“红军”与“蓝军”的较量

中国特种警察部队 (293)

☆身怀绝技的突击队员

☆精心挑选的武林高手

☆“好望号”闪击战

☆声扬博茨瓦纳

☆“蓝鸟中队”紧急出动

☆威震敌胆的“巴山擒敌队”

中国空降兵 (310)

☆中国革命终究要走出山窝窝

☆刘亚楼上将堪称中国空降兵之父

☆空降兵 40 年无战事

☆空降兵不相信眼泪

☆中国将士终于拥抱住空降时代

首次执行维和使命的中国军队 (365)

☆从中国湛江到柬埔寨磅逊

☆从“流动国土”到异域他乡

☆首次执行维和使命的中国军人

☆摩托化大开进

☆从磅逊到金边

三代领袖关注部队军政素质的提高 (373)

☆钱学森教授归国，颇费周折

☆毛泽东：兵是练出来的

☆邓小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人民解放军是威武文明之师

☆勤学苦练，才能不断提高军事人才的素质

☆在苦练的基础上注重练兵技巧

东南海域“3·18”海空实弹演习…………… (416)

- ☆硝烟重现海峡上空
- ☆四发地对地导弹成功试射
- ☆海空实弹演习
- ☆“群鹰”角逐闽南上空
- ☆“长鲸”出没南海水域
- ☆三军联合渡海登岛

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 (426)

- ☆江泽民发布驻香港部队进驻命令
- ☆先头部队进驻香港
- ☆中英防务事务交接仪式写真
- ☆新界万人欢迎驻香港部队
- ☆江主席关怀驻港部队建设

十五大江泽民提出中国裁军员额 50 万…………… (445)

- ☆中央军委确立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
- ☆邓小平当年提出军队要“忍耐”
- ☆实行三军联勤是裁军的发展方向
- ☆裁军将有利于科技强军
- ☆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邓小平与华北军事大演习

☆新任军委主席的重大军事决策

☆一号会议秘密召开

☆粟裕大将的边境之行

☆军委主席与总长对话录

☆女兵直闯“小中南海”

新任军委主席的第一个重大军事决策

院门准时敞开，挂着“辰5”字号车牌的两辆黑色高级轿车正好驶到，一先一后滑入院子。

这是1981年3月10日上午。

车上下来的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张震。礼貌有素的工作人员迎住两位将军，说：“首长在等。”便前行引路。杨得志迅速瞥一眼院落，迎春花和桃花欲开未开，枝上交凝着冬的冷峻和春的含蓄。要是换个处所，这位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老将军会当院喊主人：“我老杨来了。”但在邓小平处不行。毛、刘、周、朱、陈、林、邓，当年邓小平在新中国领导人

中位列第七。别说大将上将,即使十大元帅,能排在他前面的,也仅止两三人。

谈话预定内容:总长向中央军委主席汇报北京军区组织战役演习的方案与军委办公会议意见。在这以前,张震副总长已于3月6日呈上请示信。邓小平这么快召见,看来拍板的时间已经到了。

想到拍板,杨得志不由忆起两年前武汉事。他收到急电立即赴京。那时,他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决定,杨得志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即刻飞赴前线,接手对越反击作战部署与指挥。

杨得志戎马生涯的前半生不去说了。这后半生,他职务一步步南迁。继彭德怀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回国任济南军区司令员;1974年初,被毛泽东主席召到北京,唱过《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毛泽东宣布八大司令员对调,杨得志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二十多年,从冰天雪地的朝鲜经黄河,经长江,一直迁任到亚热带山岳丛林的南国边陲,横贯了整个中国。这一次是由他执掌从几个大军区调集的数十万大军,在全世界瞩目下去同当年作战经验丰富的地区小霸较量。在昆明军区完成作战任务之后,杨得志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其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过两年,军队已经历着艰难的工作重心转移。新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策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激扬军威,全面检验和提高军政素质,组织此次国外罕见国内空前的、方面军规模的战役实兵大演习。

杨得志敬礼。邓小平伸出手，杨得志握过，侧开身让给张震。接着各自落座。开门见山，话题直接进入演习事项。见邓小平就这么简单，不必多问候，他也不会同你拉家常，约什么事就谈什么事，一二三四，谈完就完。他征求你意见，你抓紧扼要说。他拍了板，你不要再多罗嗦一句，否则必碰钉子无疑。作为兵员人数居世界军队之首的中国军事统帅，他说一不二。而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前，他也威重令行。

杨得志说：“我们简要地把演习的方案向您汇报一下。”

张震送上演习的立体地图。

邓小平说：“这个图我着过了。”

这显然是说，整个情况我已经知道了。既如此，杨得志当即大幅度压缩汇报内容，只用几分钟时间，就预想的三个方案作简要说明，然后干脆利落地结束汇报。

邓小平用人们在电视屏幕中很熟悉的坐姿倾听汇报。他77岁高龄，耳聪目明，没戴助听器和眼镜，也不须对方说话加大音量。张震的请示信置于案头。邓小平赞同毛泽东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对世界大战的爆发可能性他有新的看法。对国际形势的这种估计，使得我们党和国家得以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他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谈到：“中国对战争的看法与过去没有什么不同，还是那三条：一、战争的危险始终严重存在；二、经过努力，主要建立国际反霸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战争是可以延缓的，可以争取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三、尽管我们判断可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但对战争不能不有所准备。”

两年前开始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由原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签署命令,但真正的拍板人是邓小平。那一次拍板真可以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愈演愈烈的中越边境冲突和越侵柬战争,使中越关系急转直下,而中苏关系尚未解冻。象是对中国的严正警告,苏联同越南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尽管如此,邓小平在亲自访美之后,义无反顾地决策了一场短促突击式的反击战。但是,这次演习的拍板并不比上一次轻松。军队领导层有着方案之急。而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和推动全党实现战略重心的转移,也无异于一场艰苦的战争。邓小平在经济战线和军事战线两面作战,承受的压力非常人所能体验。焦点在于演习要花钱,经济建设更要花钱。军费减了又减,“军队要忍耐”竟成为建军口号。邓小平明白,这是权宜之计,是闯难着之必须。但准备打仗不能靠忍耐,忍耐出不了战斗力。使和平时期军队保持战争活力,在无仗可打的情况下,只能靠演习。邓小平拍板了。

“渤2”事故的结论激怒了将军们

3月12日。三座门第一会议室。门前,轿车如林,冠盖如云。总长杨得志、国防部长耿飚、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各军兵种负责同志到会。张震传达邓小平的批示和关于演习问题的指示。杨得志讲话,表明对邓小平批示的态度,并宣布演习代号。

对这一刻,秦基伟等了大半年。

1980年初秋,秦基伟赴中原参观兄弟军区演习。演习在野战条件下进行,参观者住农村民房是题中之义。接待工作不很

严密,秦基伟的原话是:“蚊子满把抓。”尽管情绪上打了些折扣,成功的演习仍鼓舞了秦基伟。归途路过保定,他问军区作战部副部长侯希铎:“我们就不能搞个大些的演习?”秦基伟的设问已有背景。

1980年底,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下达指示,正式委托北京军区于1981年秋季组织实兵演习。

1981年1月14日,副总长张震、总长助理韩怀智及总参军训部有关人员到北京军区,了解大体设想,共同研究有关问题。

2月5日,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秦基伟登门拜年,向邓小平交上一份厚礼:演习方案设想。

2月25日,三座门第一会议室,军委及总参领导同志听取北京军区正式汇报。

3月10日上午,见邓小平前,杨得志再一次打电话给秦基伟,就演习方案作最后推敲。因此,秦基伟对邓小平的决策和演习任务的最终赋予,毫不意外但觉责任沉重。这体现在6天后。3月18日,北京军区召开工作会议,杨得志总长和杨勇副总长到会并讲话。杨得志在讲话中提到“渤海2号”事故,要求总结教训改变对军队指挥打仗的简单化看法,鼓励大家认真贯彻邓主席指示,创造一流成绩,用实际行动改善“观瞻”。秦基伟司令员紧挨杨得志坐着,由衷地感激总部领导对北京军区工作的指导和关心。

然而在3月12日的三座门第一会议室,慷慨激昂的发言主角却不是秦基伟。

邓小平的指示和关于演习问题的重要指示由张震副总长传

达后,杨得志表态,要认真贯彻邓主席指示,以最大决心组织好演习。军委、总部和各军兵种领导同志热烈发言,说邓主席给与军队最大信任,最大支持,军队要创造出最好成绩。还没演习,气先打足了。

财政部拨款的数字让杨得志如释重负,虽明显不够,但已来之不易,这是国防费之外的特批专款,如果不是小平同志决心大。他这个总长是弄不来这笔钱的。

有位老将军说:“搞演习花钱多,我们可要准备挨骂的。”花钱挨骂倒也罢了,不花钱也照样挨数落,这口气老将军们怎么也难咽下去。军队可以忍耐。国家安全能忍耐吗?高级将领们七嘴八舌。武装力量的地位、形象,被和平岁月侵蚀得不堪回首。林彪、四人帮的老帐倒也罢了,公众舆论还在往伤口上撒盐!

将军们指的是“渤2”事故。

就在头一年,石油战线发生了一起惨祸。“渤海2号”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在大风浪中倾覆;72人死亡,直接损失数千万元。一时全国震惊,舆论大哗。这起重大行政责任事故,导致直接责任者入狱,负有领导责任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石油部长宋振明,受到严肃的纪律处分。

这件事与军队毫无组织与责任的关系。但总结的一条重要教训却攀上了军队,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见诸报端。报称,教训之一,就是某些领导者仍用战争年代军队指挥打仗的那一套指导经济建设。一句话,蛮干。

说者无恶意,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没很在意这句话。但是,确实严重伤害了中国军人的职业自尊,伤害了武装力量的形

象。军界涌起轩然大波。

怎么可以拿军队形象为这件事垫背?! 军队指挥打仗的那一套就那么简单随意、一文不值吗?! 共和国的一切,就是靠这一套打出来的。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军事,毛泽东本人就是指挥艺术高超的战略家,军事家,他的军事思想和他以三大战役为巅峰的战争指导实践,在军事科学和战争史上都是醒目的得意之笔。在军人看来,“渤 2”事故恰恰违背了军队指挥打仗的科学统筹与严格组织,以及对天时、地利的详尽掌握和相应对策。严格地说,战争指导与经济建设指导是科学的两条战线,两者的高层次相通是艺术。

军队若是就此事麻木不仁和毫无反应。那将比受到伤害本身更可怕千百倍。因此,华北大演习任务下达后,军人的强烈决心和高昂士气中,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带有雪耻。争气的哀兵色彩。

由此,总部、有关军兵种和北京军区的首长的指挥机关,进入异常紧张严肃的工作状态。军事首长、作战、机要和通信部门工作量的繁剧更是超乎寻常。北京军区、空军所属许多部队相继开始高标准大强度的训练。各级的会议。文电突然激增。保密制度相当严格。随即,各部队停止休假。探亲、外出人员奉召火速返营。有些跨战略区调动的部队还控制了私人通信。多数部队的指战员经允许发了一封信,口径如队列般整齐划一。亲属被告知,部队将执行任务,不要再向营房发信。至于是什么任务,在什么地点,只字未露。实际上,许多基层指挥员也确难对演习任务全貌作出描绘。军人亲属饱经忧患的心再度怦然。南

疆？北疆？还是其他边境地区？

一号会议秘密召开

京西宾馆。

1980年的某天，全军一大批中高级军官如期报到。按照保密惯例，会议规定了代号。这里所述的一号会议，是笔者为代号所拟就的代号，以区别于出于同样考虑将在后面出现的二号会议。

尽管事先打过招呼，当与会者从贴着个人姓名标签的房间步入会议室时，一号会议的议题还是令他们紧张与陌生。

论战略方针，与会者人人都能讲一通，陌生的是讨论。自建国以来，尤其是毛泽东的威望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时，对战略方针从来只说学习、领会和贯彻。学习领会的过程当然要讨论，但那是学习的深入，是不折不扣的消化，是无条件执行的前提。孤立地提讨论、含义就不同了。政治性很强的中国人习惯于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更何况，既定的中央军委战略方针是毛泽东亲自确立的，这一战略方针熏陶了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的全体学员，参加一号会议的这些要员也概莫能外。为了好记，那个时代将其概括为“二十一字方针”，连刚入伍的新兵也能倒背如流：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打人民战争，打运动战，打歼灭战。

积22年武装斗争之经验，并在十余年和平时期巩固国防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这一战略方针，已然具有系统理论化和高度经典化的神圣性。如果说已经开始了一年多的“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标准”的大讨论,使京西宾馆的与会者们能够拂去伟人头顶的光轮,并认为对毛泽东的一些观点应该重新审视和加以修改,那也至多限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原则及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则是经过战争实践检验的,是完美无缺和无可非议的。

一号会议的指导思想恰恰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科学地分析原战略方针的缺陷,并给予新的发展的完善。诱敌深入这一原则将被放弃。

这引起了巨大震动。

事后可以说,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徐向前、粟裕等,以实事求是的战略洞察力的理论勇气、领导全军完成了一次军事战线极为艰巨的拨乱反正。开创了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崭新局面。继一号会议取得成果之后,于次年召开了二号会议,并采取理论和实践、课堂和现场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实施了震惊中外的华北军事演习。这便是华北大演习的简略由来。它与党中央、中央军委拨乱反正的巨大努力密不可分;它与体现这种努力的一号会议、二号会议密不可分;甚而大演习与二号会议使用了同一代号。

粟裕大将的边境之行

战争年代,连续多年的“剿共”作战,使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们“剿”出一句名言:中国有三个半参谋长。

三个:刘伯承、林彪、粟裕。

半个者:小诸葛白崇禧。

毛泽东器重粟裕。抗美援朝战争之初,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第一人选,即粟裕。粟裕由副总长而总长,执掌总参谋部。不久受到不公正待遇,改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迫离开军队。周恩来全力保护粟裕,安排他到国务院主持交通工作。周恩来说:“你现在已离开了部队,就在我身边,在国务院做点工作吧。”

粟裕万分感念好总理的一片苦心,可是,国家利益在上,个人安危实在不足道。于是说:“我打了一辈子的仗,不会做地方工作。”

周恩来说:“不会做,可以学嘛。”其实精细过人的周恩来岂能听不出弦外之音,但周恩来的用意既是用人,更是藏人。

粟裕对可亲可敬的总理,无保留地敞开心扉:“请求总理替我向毛主席报告,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上前线!”

“那当然。”周恩来一口应允,这正是他隐隐焦虑的大事。中苏交恶,边境紧张局势升级为多起军事冲突。珍宝岛的胜利为浓烈的政治情绪火上浇油,但周恩来知道这不是真正的较量。

果然,不到半年,周恩来为粟裕安排了沿我国北部边疆的视察工作。耐人寻味的是,周恩来与粟裕此时都没有军职,而部分军权在握的林彪如日中天,周恩来此举显然担了某种风险。更意味深长的是,毛泽东把诱敌深入作为战略方针的核心。周恩来让粟裕视察的地方却不是诱敌深入的预设战场,这件事又必须经毛泽东批准才能成行,一向谨慎缜密的周恩来当时是何考虑,已不得而知。

五千余公里的长途视察自1970年4月开始。北疆之春,冰

雪未消,肩负着周恩来总理的重托,共和国第一大将粟裕乘吉普车登程。看地形是粟裕的职业嗜好,坐吉普车看地形更是他的职业习惯。北京 212 吉普车底盘高,越野能力强,小沟小坎一跳而过,河床山坡也敢闯行,脱离公路后仍有一定的自由度。他登上一处守备阵地的制高点,捧着地图与现地对照,边听有关人员讲解边思索,不时提出一些问题。从制高点下来,粟裕又提出要到对面的制高点去参观。这是要从进攻者的角度观察我守备阵地,仅此一点,就给指战员上了一课。

边防部队指战员中敢言者大有人在,他们就防御方针和战斗结局作出悲观的估计。粟裕的心被重重牵痛了,这与他的某种担心相印合。

周恩来疲惫而忧郁的目光久久停在粟裕脸上,听大将把情况和看法说完,仍陷在沉思中。这时候,粟裕倒希望总理反驳自己,并摆出令人宽慰的分析来。然而总理的表态一字一顿:

“我同意你的观点。”

粟裕以老战士的耿耿忠心,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写出书面汇报交了上去,同时也就把命运交了出去。有的同志提醒他。该项边防建设是毛主席批准的。粟裕说,作为一个老兵,对国家安危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看到问题不说,就是犯罪;不能因为主席批了就不如实反映情况,虽是主席批的,也要看报告情况是怎样报告的。

粟裕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幸运的是,毛泽东对这位小个子同乡的谏言颇为宽容。粟裕又陆续送上了关于加强歼击机部队建设。夺取未来战争局部制空权和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作战指